

论中原王朝的“外域”出土的牙璋及其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意义¹⁾

Historical context of “Yazhang” in the peripheral zone during the early Chinese dynasties

西 江 清 高

Kiyotaka NISHIE

Abstract

“Yazha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rtifacts in ancient China, which was used to show one’s prestige and power of authorities. The earliest “Yazhang”, dating back to the Late Neolithic (Longshan Culture), was discovered in the middle to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Yazhang” enhances its importance during the Erlitou Culture, the first Zhongyuan dynasty (ca. 2000BCE – 1600BCE). “Yazhang” widely expande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stage from Longshan Period to Erlitou Period. In fact, its distribution spreads far beyond the original area, reaching NorthWest China (Gansu), SouthWest China (Sichuan), SouthEast China (Guangdong), and even Northern Vietnam. This expansion was based on the acceptance of “Yazhang” by the emerging local chiefdoms. Thus, “Yazhang” can be considered as a symbolic cultural element which reflects the inter-regional relations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early framework of China” (i.e. Erlitou Perio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Zhongyuan dynasties and the local societies in its periphery from the spatial extent of “Yazhang” and their situations of acceptances.

Keywords: Yazhang; Zhongyuan dynasty; “early framework of China”; inter-regional relations

1) 本文初稿曾在2016年10月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召开的“东亚牙璋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会后添加注释稍加整理,完成了原稿。之后在2018年邓聪先生编著的《牙璋与国家起源:牙璋图录及论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出版了。正如标题所示,该书将牙璋定位于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位置,是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一、序言

1. 早期牙璋的研究简史

从黄河流域的龙山时代开始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牙璋逐渐成为各地的地域中心的领导阶层和中原王朝王权的象征（威信财），此后在辽阔的中国大陆上扩散开来。可以说牙璋是反映公元前两千纪早期中国大陆上中原王朝形成过程和区域文化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文化因素。牙璋传播和扩散的过程反映了中国初期国家成立的历史过程和尔后“中国”世界的地理原型的形成过程。因此可以说它是中国文明形成时期极为重要的一种代表性的文化因素。

中国正式的牙璋研究始于1970年代，当时的学者曾对陕北石峁一带采集的牙璋进行集中研究，标志着牙璋研究第一阶段的开始。另一方面，大约与此同时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多件体型较大且十分精美的牙璋。牙璋在二里头遗址的出土使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它可能是研究中国大陆初期国家的重要钥匙之一，开始引起关注。

1986年四川成都平原上三星堆祭祀坑（器物坑）的发现让学者们认识到牙璋在三星堆文化及其社会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关注到成都平原与中原王朝之间存在的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也更加认识到牙璋的重要性。牙璋不仅仅是中原地区的精品，同时也传播到陕北，四川等地，是研究早期王朝时代的重要文化因素。

1994年，邓聪先生主编的《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正式出版。该论文集以香港和越南北部新发现的牙璋为契机，首次关注到牙璋这种中原王朝的文化要素也传播到了遥远的中国大陆东南部。该论文集的出版可以说标志着牙璋研究进入到第二阶段²⁾。

19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古代玉器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林已奈夫先生对包括海外收藏品在内的中国古代玉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中包括对新石器时代和早期王朝时期的玉器进行基础分类和编年研究，综合考古类型学和古典文献记载对玉器的社会功能的研究等³⁾。另外，冈村秀典先生的研究关注到从新石器时代到早期王朝形成时期，玉器的扩散所反映的各地域之间的交流关系和中原王朝形成时期中国大陆的动态⁴⁾。他还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进行分析，提出牙璋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时可能已经成为宫廷礼仪中的一种瑞玉⁵⁾。

2015年，邓聪先生和王方先生联名发表了关于早期牙璋发展过程的研究文章。他们的研究特别关注到牙璋细部特征，提取“指纹特质”进行细致的比较研究，是十分有效和登峰造极的研究方法⁶⁾。这项研究和近年河南新砦期和陕北石峁等遗址的新发现密切相关，是探讨早期牙璋发展过程的重要研究。以2000年以来成都金沙，陕北石峁，河南新砦，甘肃东部齐家文化等的新发现为基础，邓聪先生和王方先生的研究可以说标志着牙璋研究进入到新的第三个阶段。

2. 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目的

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目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探讨牙璋从山东龙山文化起源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成

2) 邓聪主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3) 林已奈夫：《中国古玉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91年。林已奈夫：《中国古玉総説》，吉川弘文馆，1999年。

4) 冈村秀典：《中国文明—农业と礼制の考古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8年，第63-77页。

5) 冈村秀典：《夏王朝—王权诞生の考古学》，讲谈社，2003年，第137-145页。

6) 邓聪，王方：《二里头牙璋（VM3:4）在南中国的波及—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起源和扩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5期。

为中原王朝王权象征的历史过程；(2) 探讨牙璋的扩散问题，即牙璋从中原王朝的王都地区向中原王朝政治圈的“外域”扩散的过程和路线；(3) 牙璋波及到中原王朝的“外域”中的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越南北部，中国东南部等地，这些相距遥远的边远地区之间相互作用和交流的渠道和模式也是本文关注的问题。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早期王朝时代牙璋的分布范围基本反映了尔后秦汉帝国时代“中国”世界的地理范围的原型。

本文对于山东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牙璋发展过程的探讨，主要是依据上述邓聪和王方的最新研究。另一方面，本文关于中原王朝的“外域”中的各地区之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关系等方面的讨论，参考了近年来越南北部和中国岭南地区新出土的牙璋的研究。此外，本文还将对笔者称为“V字形牙璋”的一种具有特色的牙璋进行专门分析，并阐明这种V字形牙璋是通过在中原王朝的“外域”上形成的广域文化传播带（从中国西北经过西南地区和越南北部至中国岭南地区的弧形地带）进行扩散的一种文化因素。

二、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王朝的政治圈的空间构成

中原王朝的“外域”是什么？笔者曾提出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王朝（夏王朝）的政治圈是由“畿内地域”，“次级地域”和“外域”等三重空间构成⁷⁾。详细内容兹不赘述，可以概略如下（图1）：

【畿内地域】

1.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本地文化具有连续性。
2. 王朝能对畿内地域进行直接统治。
3. 墓葬构成呈阶层结构。
4. 聚落构成呈阶层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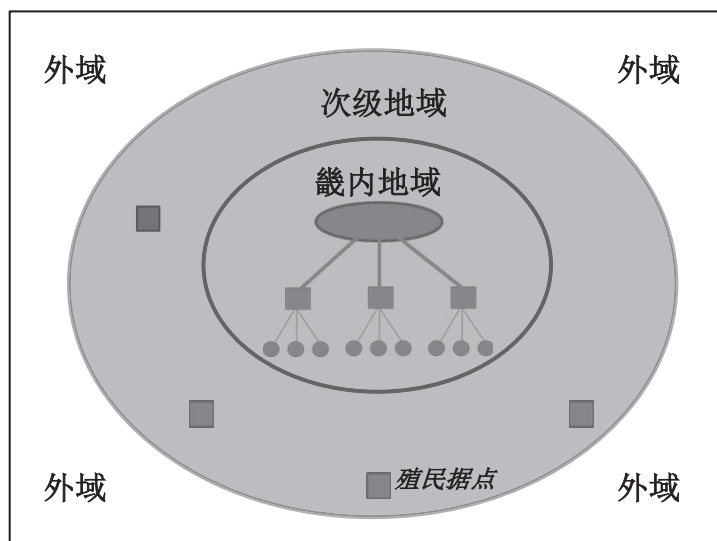


图1 中原王朝政治圈空间构成的概念图

7) 西江清高：《二里头文化期中原王朝的政治空间模式》，《夏商都邑与文化（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次级地域】

1.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本地文化发生断裂，没有连续性。
2. 为了确保资源或交通而设置殖民据点。
3. 殖民据点周围存在本地固有的土著文化。

【外域】

1. 不存在二里头文化遗址。
2. 外域的一些地域中心的领导阶层拥有一些来自或模仿自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因素。
3. 中原王朝和外域可能有某种程度的政治交流。

可以补充说明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畿内地域”是由以王都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首都圈（第一阶层），二里头文化圈内的小地域的中心聚落（第二阶层），小地域的一般小型聚落（第三阶层）构成的三层聚落结构和以推测的王墓为顶点的5级墓葬结构，聚落的阶层和墓葬的阶层相呼应，形成一种体系性的秩序。

其二，“次级地域”中分布有殖民据点，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是河南省南部的驻马店杨庄和陕西省东南部的商洛东龙山等遗址。至于“次级地域”的各个地方社会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具体的政治关系，目前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

其三，在“外域”中不存在二里头文化的遗址，但是在“外域”中存在中原王朝使用的各种形式的“礼器”等高级文化因素。“外域”的各个地域中心的领导阶层接受了来自中原王朝的礼器。此外，“外域”是一个十分广阔的范围，从中国大陆的华北北部一直延伸到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东南地区。在“外域”中也存在距离中原王朝远近的差异，正如下文将要叙述的，有必要将“外域”分为“近邻外域”和“远隔外域”分开考虑。

三、早期牙璋扩散的过程

公元前2000年前后，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末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曾经存在的多个发达的地域社会陆续崩溃。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形成的各地域社会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被动摇。在此背景下，中国大陆上几个新的地域中心相继登场。中原的新砦—二里头，陕北的石峁，甘肃的齐家文化，四川盆地的三星堆等，就是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新中心”。

在这些新的区域性中心陆续登场的同时，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整个大陆范围内地域间关系的中心。这就是所谓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中原王朝。

龙山时代末期以后出现的各地的“新中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新中心都普遍接受来自之前的或者周围的成功社会的玉器等文化因素（即外来的文化因素）作为社会权力的象征（即威信财）⁸⁾，结

8) 笔者将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等以新石器时代初期农业社会为基础而形成的新石器晚期的各地域中心，称为初期农业社会的“第一代地域中心”。公元前三千纪后半之后，这些第一代地域中心陆续崩溃。其中，在中原等地区出现了新的地域中心——统合了整个区域的政治实体。这种新的地域中心可以称为初期农业社会的“第二代地域中心”。第二代地域中心是一种新兴的政治势力，以往的已经衰落的威信财不再能满足其领导阶层的要求，亟需新的权威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它们选择接受外来的文化要素作为新的威信财。这是第二代地域中心的共同特征。按照邓聪等先生的观点（注6论文，第7页），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中原王朝为“原生国家”，之后在中国大陆各地成立的是“次生国家”。“原生国家”和“次生国家”是很重要的概念。在以二里头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中央—地方”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新石器末期以后在各地出现的“新中心”被编入其中而成为“次生国家”（例如四川三星堆等）。另外，在中原王朝的影响下兴起的各地域中心可能也是“次生国家”的一种形态（例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很可能包括岭南地区等）。这些问题也是将来要研究的课题。

果在这些新中心形成了多元化的玉石文化。玉器以这种形式在各个新中心之间的相互交流中跨越时间和空间在更广阔的空间中扩散开来。

笔者认为早期牙璋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过程（图2）：

（1）第一过程

黄河流域早期牙璋最初的发展过程可以参考邓聪和王方先生的最新研究⁹⁾，笔者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同时此处亦暂时先省略详细的形态学描述。

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牙璋见于山东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特征性的“龙山型”牙璋之后，牙璋的形态开始发生变化。近年在河南省郑州市花地嘴遗址中发现了两件完整的牙璋和一件牙璋的残片¹⁰⁾，其形态还保留着“龙山型”的特征，但同时其两侧的扉牙特别地发达，这是稍后时期流行的牙璋特征的萌芽。但是这些新砦期的牙璋与之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出现的“二里头型”牙璋并不具有直接的联系。

另一方面，近年来因为发现大规模的城址而引起大家关注的陕西省北部的石峁遗址也出土了很多早期牙璋。石峁遗址的年代大约相当于龙山时代末期至夏代早期¹¹⁾。该遗址很早就有牙璋出土，戴应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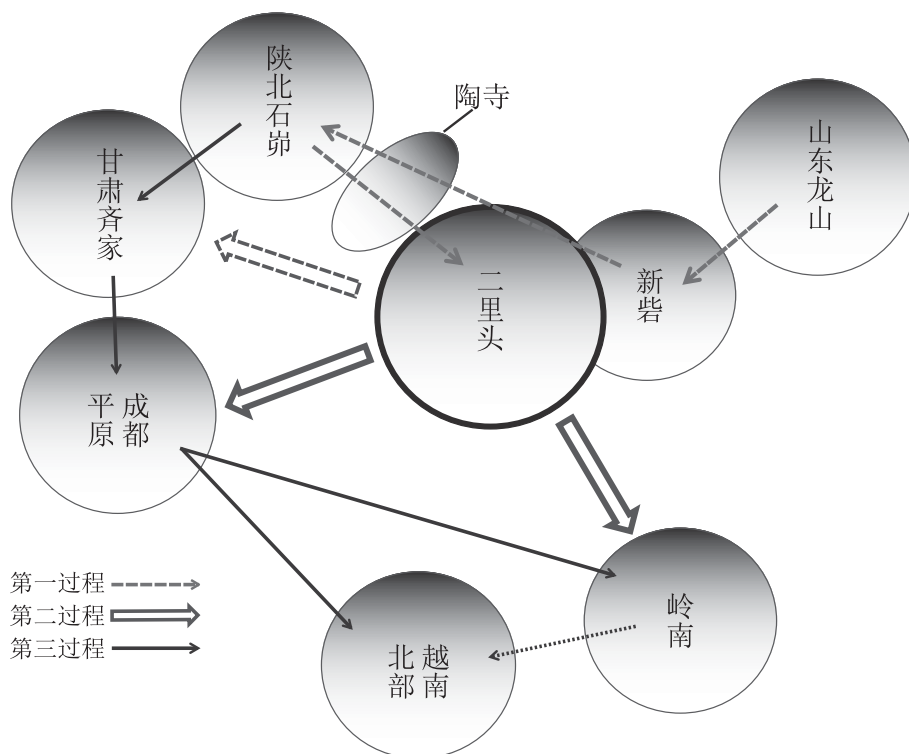


图2 早期牙璋发展的三个过程

9) 注6论文。

1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巩义市花地嘴遗址“新砦期”遗存》，《考古》2005年第6期。
顾万发，张松林：《论花地嘴遗址所出墨玉璋》，《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 二》下，科学出版社，2010年。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

先生曾著文介绍了1970年代以降从石峁遗址收集的35件牙璋,最近的发掘和调查中又新出土了2件。此外,还有不少流失到海外,譬如1929年萨尔蒙尼(A. Salmony)在北京购入后流散国外。石峁出土的牙璋中有不少属于“龙山型”牙璋,但是同时也有不少独具石峁特色的扉牙特别发达的牙璋。笔者将后者称为“石峁型”牙璋。“石峁型”牙璋的扉牙的形状独特,林已奈夫先生曾将其命名为“业字形鉏牙”。

石峁型牙璋之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遗址出现了一种新型牙璋。二里头遗址迄今出土的4件牙璋都属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二里头文化后期),还没有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牙璋出土。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年代可能与目前推测的石峁遗址的下限相衔接,因此从年代早晚关系来说二里头文化的牙璋应该是衔接“石峁型”牙璋。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牙璋具有共同特征,可以称为“二里头型”牙璋。根据邓聪等先生的研究,“二里头型”牙璋的若干要素可能源自“石峁型”牙璋,但是两者之间仍有不少差异,可能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¹²⁾。

笔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具有与山东龙山文化,新砦期,石峁等各型牙璋明显不同的特征,即:器身的大型化(长达50厘米上下),扉牙的复杂化和所谓的“龙形化”,细线刻纹的精细化¹³⁾。

二里头文化三期可能是二里头文化中原王朝最鼎盛的时期,这时登场的“二里头型”牙璋成为中原王朝最鼎盛时期的礼仪体系的一部分,同时牙璋作为一种象征王的政治权威的玉器其自身也发展到顶峰。

早期牙璋的发展过程中仍有许多空白。例如位于中原地区的新砦—二里头和陕北地区的石峁中间位置的山西南部陶寺文化(还没有发现牙璋)在历史上的作用,值得特别注意。笔者期待今后能有新材料发现和更深入地研究。

(2) 第二过程

在二里头文化中原王朝的王都登场的“二里头型”牙璋,呈放射状扩散到四川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岭南地区,东南沿海等遥远的中国南方地区。

这种现象应该是在中原王朝的王都诞生的作为玉礼器的牙璋向中原王朝的“外域”中的各个地域的中心扩散,并被各地域中心接受的结果。中原王朝“外域”中的各地域中心的首长层普遍接受了在中原王朝礼仪中担任高级文物的牙璋作为自己的威信财,来加强自身的权威。

从“二里头型”牙璋在中国大陆的分布来看:①二里头文化圈中牙璋集中在二里头遗址;②二里头文化圈的其他遗址基本上不出土牙璋(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是例外);也就是说牙璋只集中在王都,中原王朝政治圈的“畿内地域”和“次级地域”基本不出;③另一方面,中原王朝的王都与二里头文化圈—中原王朝政治圈以外的“外域”的地域中心(地域首长层)之间,以及这些地域中心之间,牙璋作为一种具有政治含义的物品在其间得以交流和传播。

“二里头型”牙璋(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其它玉礼器和青铜礼器一样)按照中原王朝的王都和“外域”的首长层之间“点和线”的关系扩散,位于它们中间的二里头文化圈内的“畿内地域”,“次级地域”的几乎所有遗址以及“外域”的中心地以外的遗址中基本上都没有出土。这种文化要素的扩散模式正是在某种政治关系的作用下,文化要素得以跨越巨大的地理空间扩散开来。

三星堆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末期以后诞生的“新中心”之一。它是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的宝墩文化

12) 注6论文,第18页。

13) 邓聪先生等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 VM3:4 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它具有牙璋巨大化,威慑形制与繁缛纹饰,扉牙龙形化等三个特征。关于扉牙,“VM3:4 扉牙过去所谓‘张嘴兽头饰’就是龙的侧面象征,是牙璋龙化一种宗教神力的添加”。注6论文,第17页。

衰落之后，新形成的以广汉三星堆遗址为中心，覆盖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和政治圈¹⁴⁾。三星堆文化具有“新中心”的特征，它接受了在其之前的成功社会的玉器（良渚文化的玉器）和同时代的成功社会即中原王朝的玉器。

三星堆的牙璋的形态特征继承了二里头文化牙璋的基本特征。三星堆牙璋的扉牙与“二里头型”牙璋的扉牙拥有共同的特征。另一方面，三星堆的牙璋中还有很多器身基本形制酷似二里头型，但是刃部却呈“V字形特征”的实例。刃部呈“V字形”是下文将要叙述的“第三过程”中从中国西北部传播而来的特征。在三星堆文化中，源自中原王朝的文化因素和源自西北地区的文化因素融合在一起。

三星堆文化的牙璋出现的年代约始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在相当于中原商王朝的时期仍然继续盛行。三星堆文化以后，成都平原中心的十二桥文化的金沙遗址仍然出土了不少牙璋。可见牙璋传入成都平原以后逐渐成为当地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成为当地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据邓聪等先生的详细研究，岭南地区和福建等地出土的牙璋的扉牙基本上是继承了“二里头型”的特征¹⁵⁾。笔者认为这是从中原王朝跨越广阔地域传播而来的一种高等级的文化因素。

除了上述来自中原王朝的牙璋之外，岭南地区还发现有四川三星堆文化中见到的刃部呈“V字形”特征的牙璋。这些刃部呈“V字形”的牙璋可能是在下文将要叙述的早期牙璋发展的“第三过程”中从四川三星堆传播过来的。另外，岭南地区还出土过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里已经消失的“龙山型”类似的牙璋，可能也是通过四川三星堆传播而来。岭南地区“龙山型”牙璋的来源还有待今后更深入的研究。

(3) 第三过程

早期牙璋发展的第二过程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牙璋从中原王朝向周边边远地区的“外域”扩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第三过程”中牙璋主要是在中原王朝“外域”中的各个地域中心之间进行交流和扩散。

牙璋扩散的路径是：陕北（石峁）→甘肃东部（齐家文化）→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越南北部及中国岭南地区。笔者认为牙璋扩散的这一路径和过程正反映了中原王朝“外域”上带状文化传播带的形成。

从中国西北部经过成都平原传播到越南北部和中国东南部的典型的牙璋是笔者所谓的“V字形牙璋”，在下一章中将详细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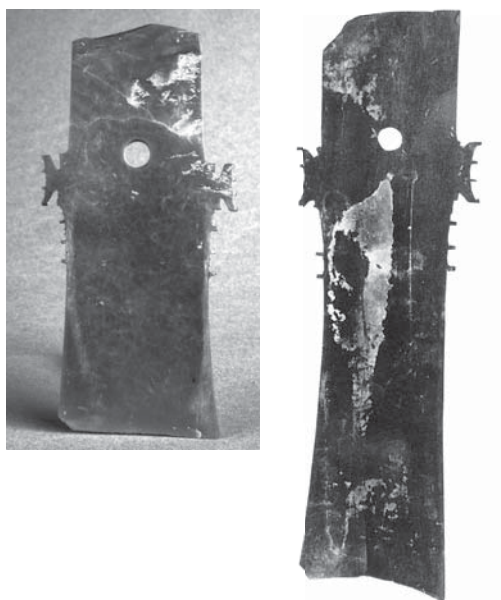
第三过程牵涉到的地理范围很广，目前还有很多考古资料不足的空白地区，其中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指出：

在从中国西北部到四川的路线上，位于中间的甘肃东部地区据有重要地位。目前该地区的考古资料还很不足，但是值得注目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存在反映出陕北石峁遗址和新石器时代末期甘肃东部齐家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资料。图3是陕北石峁的牙璋和甘肃清水县出土的牙璋。图3-2石峁的牙璋具有上文所述林巴奈夫所谓的“亚字形鋸牙”的扉牙，是典型的石峁型牙璋。图3-1是甘肃东部清水县出土的牙璋，它的扉牙与石峁型牙璋的“亚字形鋸牙”式扉牙非常相似，侧面也有三对小突起。虽然清水县出土的这件牙璋器身较短（有可能经过改造），但是从照片来看其玉质与石峁的牙璋很接近，清水县出土的这件牙璋可能原本就来自石峁。现在齐家文化的玉器越来越引起研究者们关注，许多问题还在研究的过程中。

从甘肃东部南下到四川成都平原的道路，意味着从黄河上游移动到长江上游，虽然绝对没有平坦的

14) 西江清高：《关于重建四川古代史的几个问题》，西江清高主编《扶桑与若木》，巴蜀书社，2002年。

15) 注6论文。



1 甘肃清水县

2 陕西北部石崩

图3 陕北石崩和甘肃清水出土的牙璋

道路，但是下文将要叙述的V字形牙璋从陕北（可能经过甘肃东部）向四川盆地的扩散无疑证明了还是存在交流的途径。

在越南北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到晚期的冯原（Phung Nguyen）文化中发现有牙璋出土。据彭长林先生最近的研究，越南北部出土的牙璋，其形制与四川三星堆牙璋有诸多相似之处，是受四川三星堆文化影响，在当地仿造的。他指出：三星堆文化的牙璋是双面刃（中原二里头文化的牙璋也是双面刃）；与之相对的是越南北部出土的牙璋的刃部基本上都是单面刃（龙山文化的牙璋大多是单面刃），这应该是仿造的根据。单面刃的特征也见于与越南北部毗邻的中国岭南地区，前者是受后者影响的可能性似更高¹⁶⁾。

引人注目的是与以上“第二过程”和“第三过程”相关联的一种被称为T字形环（突沿玉石镯）的玉石器。据吉开将人先生的研究¹⁷⁾，T字环起源于龙山时代的黄河流域，随后沿着两条路线向南方传播（图4）：一条是从中原王朝（商王朝）经过长江中游传播到岭南地区（公元前两千纪后半期），另一条是从四川三星堆向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传播的渠道（公元前两千纪中，后期）。虽然T字形环的扩散和传播的确切的途径与年代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和空白部分，但是它和牙璋从中原王朝向外域扩散的“第二过程”以及牙璋在中原王朝外域中的各个地域中心之间的交流和扩散的“第三过程”有很多相同之处，这对我们了解牙璋的扩散过程很有裨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岭南地区的T字形环从中原经过长江流域传播过来的可能性更高，而越南北部的T字形环是从中国西南部的三星堆传播

16) 彭长林：《越南北部牙璋研究》，《华夏考古》2015年第1期。冯原文化的牙璋的器身的特征很明显地与三星堆的牙璋相同。另外，彭长林先生也指出除了牙璋外，冯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细高柄豆，T字形环等可能也是来自三星堆文化。另一方面，他还指出越南北部可能向四川输出海贝，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双向交流。

17) 吉开将人：《论“T字玉环”》，《南中国与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图4 T字形环的分布

过来的可能性更高。牙璋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相似的两条路线，这两条路线最终在中国岭南地区和越南北部交汇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文化面貌。

四、“外域”中V字形牙璋的相关问题

在讨论早期牙璋扩散的第三过程即牙璋在中原王朝“外域”的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和扩散的过程时，笔者将V字形牙璋称为极有特点的一种牙璋，在中国西北部，四川成都平原，越南北部和中国岭南地区都有出土。因此可以说它是证明这些地区之间存在交流关系的最好的考古资料。

早期牙璋的大部分可以分成两种类型：①刃部呈浅U字形弯曲；②刃部呈V字形曲折（与稍稍弯曲不同，V字形是像三角形一样直直地曲折）。

在山东龙山文化和中原的新砦期一二里头文化中，目前还没有发现过V字形牙璋。另一方面，在陕北石峁，四川三星堆文化，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以及中国岭南地区，都可以看到U字形和V字形两种类型的牙璋并存。在二里头文化中中原王朝，U字形牙璋高度发达，V字形牙璋却不存在。可见后者是在中原王朝的“外域”中的中国西北部，西南部，越南北部，中国东南部之间交流和扩散的一种牙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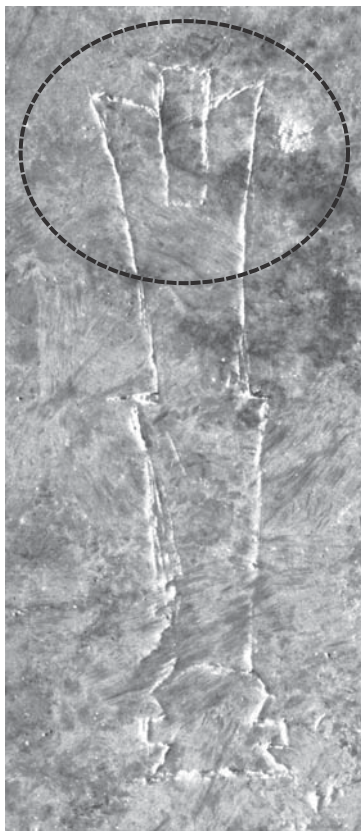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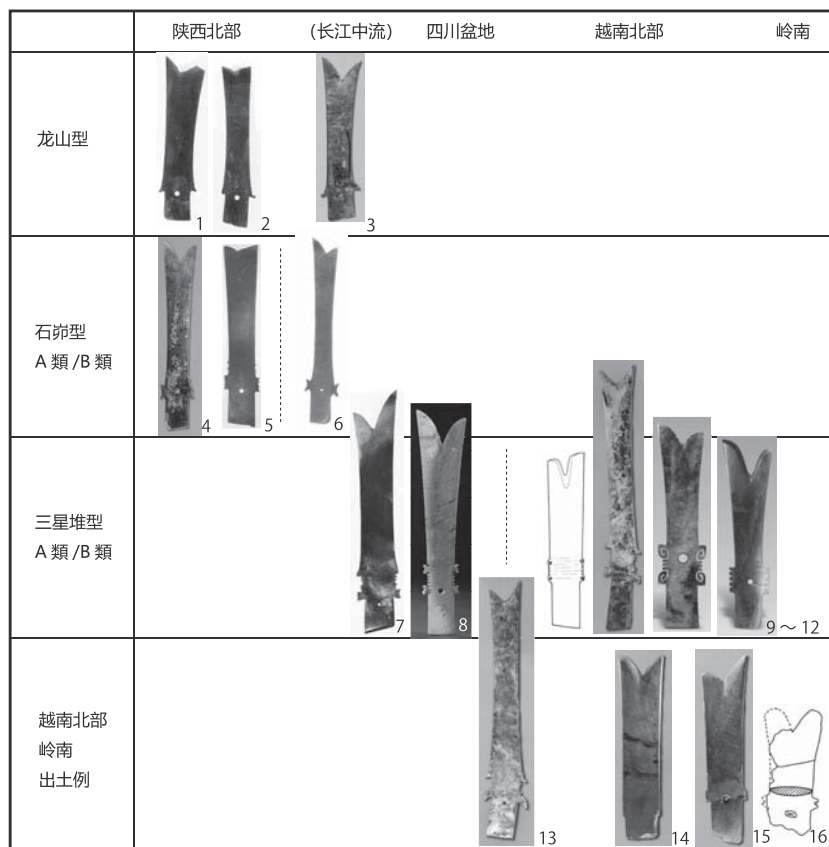
图5 良渚文化一件玉璧上的刻绘

V字形牙璋的起源现在还不是很清楚¹⁸⁾。而且一般的U字形和V字形之间是否存在意识上的区别也还不明确。

现在大家熟知的最早的V字形牙璋出自陕北石峁(公元前两千纪早,中期)。接下来是四川三星堆(公元前两千纪中,晚期),越南北部冯原文化(公元前两千纪中,晚期)。岭南地区的牙璋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晚期或以后才出现。因此,V字形牙璋最早先在陕北石峁发达起来,尔后(可能是经过甘肃东部)传播到四川三星堆,再后才传播到越南北部和中国岭南地区。

按照扉牙形态特征的不同,V字形牙璋大致可以划分为“龙山型”,“石峁型”和“三星堆型”。根据扉牙形态特征的简化程度和形态变化反映的早晚关系,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石峁型A类和B类,三星堆型A类和B类。下面将对V字形牙璋在各地的扩散过程进行详细说明(图6)。

18) 目前知道的一个例子是良渚文化的一件玉璧上刻绘有与V字形牙璋类似的器物。图5是牟永抗先生瞩目的资料。牟永抗:《南丫岛「牙璋」探微—关于玉礼兵的若干思考》,《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图版19-1。值得考虑的是V字形刃部夹在或者安上什么其他东西。如果牙璋?原来有这样用法的话,作成V字形刃部是合理的形式。另外,顾万发先生瞩目的凌家滩发现的一件V字形特色的石质器物也是需要注意的。顾万发:《“牙璋”造型,内涵,来源,定名及相关问题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等编《东亚牙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郑州,2016年,第15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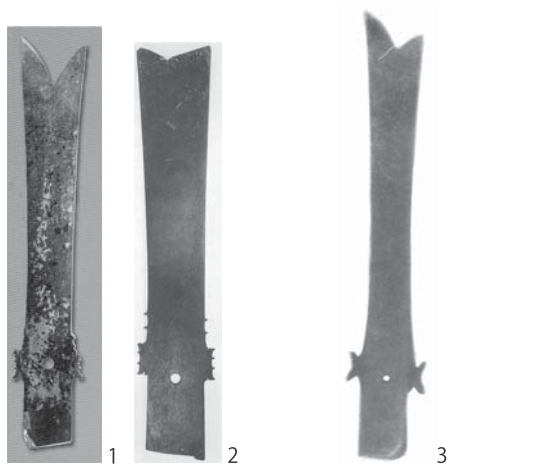
1, 2, 4~6: 陕西石峁, 3: 湖北汪房屋场, 7~12: 四川三星堆, 13: 越南 Xom Ren, 14: 广东仙桥山前村, 15: 广东红花林, 16: 广东平远寨顶上山

图6 V字形牙璋的变迁和扩散

(1) 陕北石峁遗址既出土有 U 字形牙璋同时也有 V 字形牙璋，它们的器身和扉牙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扉牙都可以分为“龙山型”和“石峁型”（石峁固有的“业字形鋸牙”）。“石峁型”的扉牙又可以细分为：A 类，形态复杂；B 类，形态简略，省略掉了一部分突起（图 7）。A 类年代更早，B 类可能是较 A 类稍晚产生的新形态。下文指出，在湖北省汪房屋场遗址采集的“龙山型”和“石峁型”V 字形牙璋，两者的年代相差不大。

(2) 陕北石峁和湖北汪房屋场（石家河文化晚期）出土的“龙山型”V 字形牙璋，表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陕北和湖北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交流。这种类型的牙璋在中原的新砦—二里头文化中还没有出土过。图 8 是汪房屋场采集的 2 件牙璋，图 8-1 是典型的“龙山型”V 字形牙璋，其 V 字形稍向外翻；图 8-2 牙璋的刃部可能是破损后经过修复，它的扉牙是典型的“业形状鋸牙”，与“石峁型”B 类 V 字形牙璋的特征一致。这两件牙璋是在汪房屋场遗址的同一地点同时采集出土的，该遗址的构成也比较单纯，因此似乎可以推测这两件牙璋可能是在比较接近的时期制作的¹⁹⁾。从这件例子再结合石峁遗址的发现来看，“龙山型”和“石峁型”V 字形牙璋的年代可能相差不大。

19)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观音挡汪家屋场遗址的调查》，《文物》1999 年第 1 期。



V字形牙璋石崩型A类
1: 石崩
2: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V字形牙璋石崩型B类
(石崩出土?)
3: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图7 陕北石崩出土V字形牙璋



1: V字形牙璋龙山型
2: 石崩型扉牙(石崩型B类)

图8 湖北汪房屋场采集的牙璋

(3) 四川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也是既出土有刃部呈U字形的牙璋同时也有V字形牙璋。此外,也有一些刃部做成类似戈或者刃部装饰鸟形等现象,变化多样。扉牙的特征有的类似“龙山型”,但是更多的是模仿二里头文化的扉牙并加以改变。三星堆文化中的“龙山型”牙璋可能是受到陕北石崩的影响。但是三星堆还没有发现陕北石崩最具特征的“业字形状钺牙”式扉牙。

“三星堆型”V字形牙璋的形态特征是融合了陕北石崩的V字形刃部和中原二里头文化的扉牙而产生的一种混合形态(图9)。这样来看,三星堆文化牙璋形态特征上的这种融合性,正是前述的早期牙璋发展的第二过程和第三过程在四川成都平原上合流的证据。

“三星堆型”V字形牙璋的扉牙略有差异,可以细分为A类和B类:A类的扉牙明显是继承自二里头文化;B类则是包括涡状纹等“二里头型”牙璋没有的新要素在内的三星堆自身独特的因素。A类的年代较早,可能与中原地区的年代接近,B类则是在接受A类之后产生的新形式,年代晚于A类。但是,正像图10所示的这件牙璋一样,它拥有典型的A类牙璋的器身和扉牙(刃部附加有鸟形装饰),但是在它的器身上却描刻着B类牙璋的形象。这或许暗示着A类和B类(更加刃部鸟形装饰牙璋)的年代相差不是太久。

(4) 在越南北部同时存在刃部呈U字形和V字形的两种牙璋。越南北部的牙璋的扉牙,明确包含有来自三星堆的特征,看不到来自陕北石崩的特征。但是,越南北部发现的“龙山型”牙璋却可能是从陕北石崩经过三星堆传播过来的。

岭南地区出土有不少U字形牙璋,也有一些V字形牙璋。后者可能是来自三星堆文化。另外岭南地区还有一些“龙山型”牙璋,但其来源还不能确定。从年代来看不大可能直接来自山东龙山文化,有可能还是经由三星堆传播过来的²⁰⁾。

20)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广东乐昌岐岗岭遗址采集的一件残石器(图11)。它的“扉牙”的形状类似石崩型的“业字形钺牙”,这或许暗示着陕西石崩和岭南地区的交流。待今后更深入的研究。杨式挺:《浅说粤港「牙璋」及相关器物—夏商周文化南传迹象探微》,《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175页,图23-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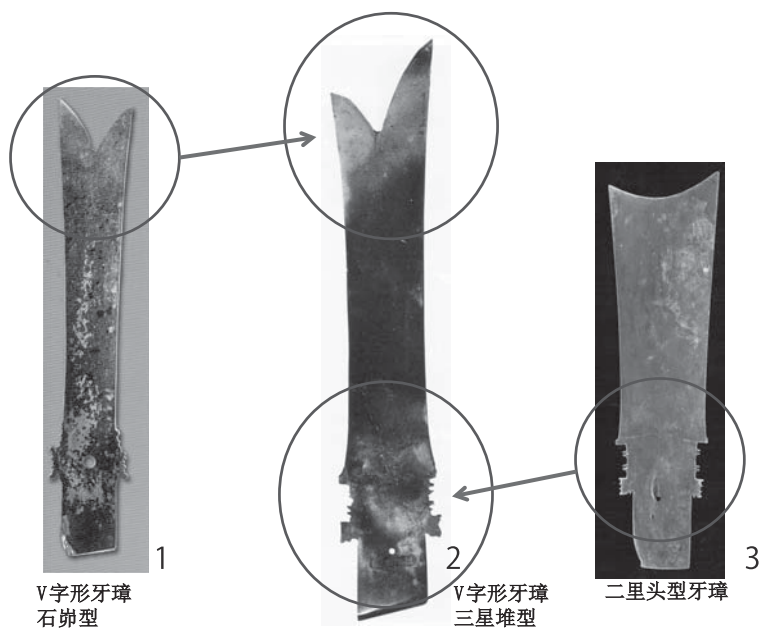


图9 三星堆文化V字形牙璋形态的融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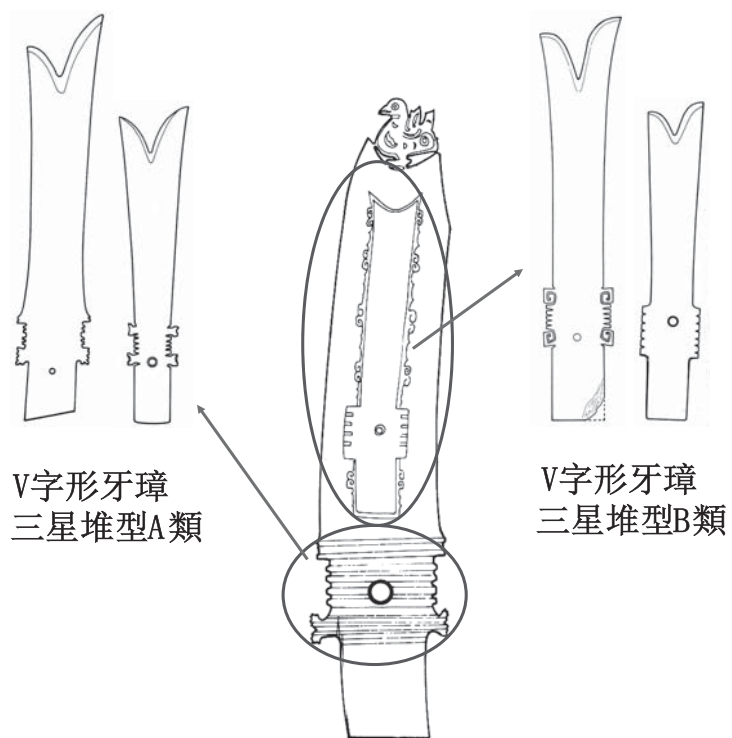


图10 三星堆型V字形牙璋的A类和B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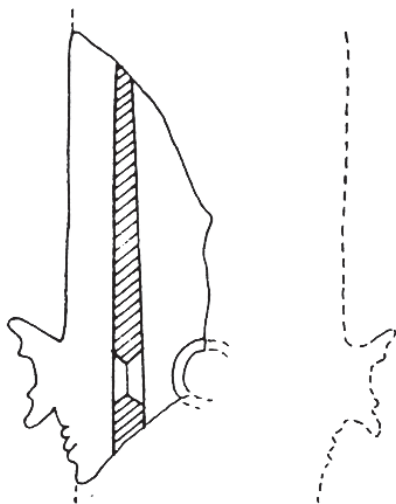


图 11 广东乐昌岐岗岭遗址采集的残石器

上文讨论早期牙璋发展的第二过程时曾指出，岭南地区的牙璋的基本特征是有来自中原王朝的“二里头型”牙璋，它们可能是从中原王朝越过广域空间扩散到遥远的岭南地区和福建等地。

岭南地区牙璋的出土地点分散在广西，广东，香港，福建西部等地的多个遗址。这种情况与四川盆地和陕北等地区拥有三星堆—金沙或者石峁一样突出的地域中心遗址，牙璋集中在中心遗址的情况不同。公元前两千纪中，晚期中，岭南地区很可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地域统合和地域中心性遗址，而是在比较小的各个地域单元中各自有着来自中原王朝或四川三星堆的影响；或者是某个地域单元先受到影响，然后在本地区各地域单元之间的相互交流中扩散开来。

从当时小地域单位分割严重的中国岭南地区向外部进行文化输出和辐射的能力并不很强，它和毗邻的越南北部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交流，但是这种关系可能不是太密切，不值得特别强调。

从三星堆经过越南北部扩散到岭南地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反过来从三星堆经过岭南地区扩散到越南北部的可能性也很小。但是，考虑到中原王朝向南方的扩散有时也越过了中间地带，越南北部不经过岭南地区作中介而直接与中原王朝发送接触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否定。这是值得今后研究的课题。

综上所述，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V字形牙璋最早出现在中国西北的陕北石峁。在石峁，V字形牙璋“龙山型”和“石峁型”并存。这些V字形牙璋可能经过甘肃东部的齐家文化南下到达四川成都平原，被三星堆文化接受和吸收。在三星堆，这些V字形牙璋与三星堆接受的中原王朝“二里头型”牙璋相遇并融合在一起，结果诞生出一种兼具“二里头型”牙璋的扉牙和石峁的V字形刃部特征的混合形态，也就是V字形牙璋的“三星堆型”。V字形牙璋“三星堆型”形成之后，跨过崇山峻岭和广阔空间传播到越南北部，被当地的冯原文化接受和吸收。大约与此同时三星堆的U字形牙璋和从石峁传播到三星堆的“龙山型”牙璋也传播到越南北部。另一方面，四川三星堆的牙璋从另外一条路线传播到中国岭南地区。岭南地区除了来自三星堆的牙璋外，还有从中原王朝南下飞越长江流域传播过来的牙璋。

可以说，作为一种从中国西北部经过西南部，越南北部及中国东南部进行传播的文化要素，V字形牙璋的传播和扩散过程充分说明围绕中原王朝的“外域”存在着一条带状文化传播带。

五、结语：牙璋的分布和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化领域

牙璋是反映中国大陆初期国家成立的历史过程和“中国”世界的地理原型形成过程的极其重要的文化要素。牙璋在二里头文化（夏王朝）“外域”的辐射正是形成时期的“中国”世界的真实写照。

笔者在1990年发表的论文中曾对春秋战国时代铜剑的分布范围和规律及其反映的“中国”文化领域的范围进行过系统的研究²¹⁾（图12）。在该文中笔者指出“中国”的文化领域的边缘部分位于华北长城一带，四川盆地，岭南地区等地，其外侧轮廓线也是“中国”的文化领域的边界线。这个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的文化领域与夏商时代中原王朝的“外域”的扩展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国家的疆域也存在某种联系²²⁾。

从与中原王朝的距离来看，中原王朝的“外域”有可能是由二重结构构成的：①与中原王朝存在直接交流关系的地域，即“近邻外域”（成都平原，岭南地区等）；②与中原王朝不存在直接交流关系的地域，即“远隔外域”（越南北部，云贵高原等）。但是，以中国西南的成都平原和东南的岭南地区为桥梁，越南北部等地也可以间接地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从春秋战国时代的铜剑反映的“中国”的文化领域来看，“近邻外域”相当于铜剑反映的“中国”的文化领域“内”的边缘地区，“远隔外域”相当于外侧接触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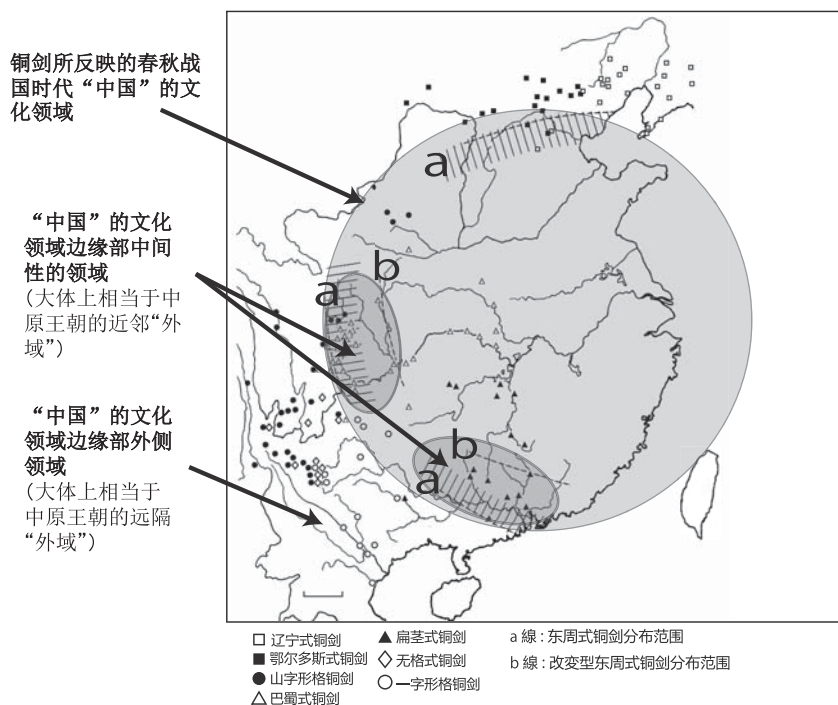


图12 铜剑所反映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化领域

21) 西江清高：「中国」的文化領域の原型と「地域」文化》，《文化人類学》第8号，アカデミア出版会，1990年。

22) 小澤正人，谷豊信，西江清高：《中国の考古学》，同成社，1999年。

Acknowledgmen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draft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Yazhang” (“东亚牙璋学术研讨会”) held in 2016/11, Zhengzhou, China. Author would like to thank Prof. Deng Cong (邓聪)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his valuable advices during the conference. Also, author appreciate Dr. Lu Guoquan of Shandong University for his Chinese translation work, and Dr. Watanabe Nobuya of Chubu University for his English translation, as well as their advices.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JSPS KAKENHI Grant Number JP15K02993, JP18K18545, Nanzan University Pache Research Subsidy I-A-2 for the 2017 academic year, and DAIKO FOUNDATION.

插图的引用

图 1 笔者制作

图 2 笔者制作

图 3 1: 清水县博物馆提供

2: 邓聪主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彩版 8

图 4 依吉开将人:《论“T 字玉环”》,《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 图 32-1

图 5 牟永抗:《南丫岛「牙璋」探微—关于玉礼兵的若干思考》,《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 图版 19-1

图 6 1, 2, 7:《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 彩版 8, 8, 13

3, 4, 10, 13 ~ 15: 邓聪, 顾万发主编:《东亚牙璋图展》, 香港中文大学, 2016 年

5: 林巳奈夫:《中国古玉の研究》, 吉川弘文馆, 1991 年, 图 6-110,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藏)

6: 邓淑苹:《「牙璋」研究》,《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 图 7-3: 2,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藏)

8, 11, 12: 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 玉器·石器》, 天地出版社, 2009 年, 32, 35, 33

9: 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星堆祭祀坑》, 文物出版社, 1999 年, 图 198

16: 杨式挺:《浅说粤港「牙璋」及相关器物—夏商周文化南传迹象探微》,《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 图 23-1: 10

图 7 1:《东亚牙璋图展》

2: 林巳奈夫:《中国古玉の研究》, 图 6-110

3: 邓淑苹:《「牙璋」研究》,《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 图 7-3: 2

图 8 1, 2:《东亚牙璋图展》

图 9 1, 3:《东亚牙璋图展》

2:《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 彩版, 13

图 10 《三星堆祭祀坑》, 图 199-3, 2, 图 41-1, 图 200-1, 图 198-4

图 11 杨式挺:《浅说粤港「牙璋」及相关器物—夏商周文化南传迹象探微》,《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 图 23-1: 16

图 12 笔者制作